

走向世界需重拾天下情怀

□ 孙向晨

有“天下为公”的价值观念,梁漱溟曾说:“中国人是富于世界观念的,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都没有,中国人对于世界向来是一视同仁。”

其次,狭隘的民族概念在文化上产生的自我矮化的作用。在被迫接受了民族国家的概念,进入所谓的“世界体系”后,在文化心态上付出了极大代价。这种心态预设了一个更高的世界标准,凡是中国的,都是特殊的;凡是国外的,则是世界的。于是,就有了“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主流社会”之类的说法,把强势文化看作普遍原理而加以认同,自己整合出来的无非是较西方世界次一等级的东西。

最后,无法面对多民族的国家状况。狭隘的民族论完全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质,以这种方式很难想象如何维系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当放弃了中华文明的普世性的特质后,就失去了文化的普遍感召力。一种对民族的狭隘理解可能直接导致国家的分裂,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就会激显出来。基于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观念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会形成一系列挑战。民族主义的危险性在于它以自己的名义行事,其本质却是政治性的。事实上,民族国家的观念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的文明形态来说,是完全不适合的。

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显然不适合中国这样具有文明特征的国家,这种源于西方彼此区隔,基于族群差异的概念,对于中国这样包容性的文化传统是一种极大的破坏。

我们更应该以“文明国家”来定位现代中国,这可以让我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真正的立足点

事实上,民族和国家并非一定要结合,历史上不是这样,现实中也不是这样。很多研究中国的学者敏锐地感到,在中国,将民族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尤其不适合。梁漱溟就曾将“中国不像一国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称之为“天下国”。美国学者白鲁恂说“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是一种文明,而伪装成一个国家。”“确实中国文化传统自有一套关于‘国家——世界’的理论,即便是要确立现代中国的定位也依然要顺应一种深厚传统。对于有着这样一种以文明自许的传统来说,‘文明国家’将比‘民族国家’的概念更有包容力,更具凝聚力,更符合现代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国家形态。”

我们更应该以“文明国家”来定位现代中国。“文明国家”较之“民族国家”,其在价值形态、生活方式、礼法制度、文明理想等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系统,是一个完整的“意义世界”,同时具有一种向善的典范性,其包容性和普世性是民族或者民族文化的概念所容纳不了的。民族国家在其起源上是以“自我”和“他者”的对峙作为前提,更强的版本则以区分敌我作为其建构的基本机制,差异性和区分异族是建构“民族”的基本路径。

在文明概念中“天下意识”非常重要,这是一种中国式的普世向度。正如我们所分析的,在“民族国家”中,这种普世关怀的向度得不到声张,甚至完全丧失。作为“文明国家”,在本质上有着人类共享的普遍价值,文明为人类建立了普遍的道德和生活意义的标准。现代中国并不只是1844年以后的产物,现代中国承载的是源远流长的文明传统,是“作为人类,代表人类,为了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国度。“文明国家”的定位可以让我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自己真正的立足点。我们必须承认,文明所显示的这种人类的代表权自近代以来已经自觉地拱手相让于西方,西方哲学家以理性名义对自身文明的自我确证,更让现代中国人盲目臣服于西方中心主义,于是西方成了普世世界,而中国则只是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文明类型。事实上,中国作为“文明国家”其普世性维度一直顽强地存在着,文明的整个价值形态决定了它不只是民族性的、区隔性的,文明更呈现其共通的一面。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普世性在于中国人在这种文明的发展中特别发挥出了人类的诸多潜能,并提供了其中好之为好的基本标准,这种文明成果是可以为人类所共享的。

“文明国家”自然包含着多民族的状况。在中华文明下,多元一体格局将继续保持下去。我们将以“文明”而不是“民族”的方式建构国家认同,欧洲过往强烈的民族认同,带给欧洲不断相互竞争的动乱,在欧盟超国家的框架下,欧洲人开始建立其对于欧洲文明的认同。美国作为文明国家也不以民族主义作为国家认同,美国建国时的清教主义精神,以其普世性涤荡了民族主义狭隘性。

在文明国家的前提下,我们需要建构新的“文明国家”的世界体系,因为不光中国是“文明国家”,印度是文明国家,东盟是文明国家,甚至美国也是代表西方类型的文明国家。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文明并没有穷尽人类的意义世界,源自中国的文明,源自印度的文明依然有能力对人类共享的“现代文明”做出贡献,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更广泛的“文明国家”的世界体系理论。这对于理解现代世界,并且促进现代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有着非凡意义。我们亟须从新的视野来理解“文明国家”体系,通过文明对话和共融,建构新的世界体系和全球秩序,这将是一个不同于以往西方所主导的全球秩序。

“天下”观念是中国文化最具特色、最具宏大愿景的一面,这在全球化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

中国的文化传统一直以极大的胸襟接受其他文明的宝贵资源,如魏晋之接受印度佛教文化,明末之接受西学东渐,现代之接受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抵触,一种包容天下的胸襟。作为文明中国,不仅仅是要包容天下,也还必须在全球化的时代,以“天下为怀”的境界,回馈整个世界。

“中国”和“天下”在古代“六经”中都可以找到,“中国”概念与“天下”概念是联系在一起,“中国”是一个与“天下”相对应的概念。在“天下”的范围内,“中国”就是一个示范性区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明国家”。所以说,“中国”在本质上和西方“民族国家”概念不是一回事。今天我们光把“中国”这个词留下了,使之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把“天下”给遗忘了。没有“天下”哪有什么“中国”。古时候讲“天下”现在来看只是有限的区域,天下秩序也不过是区域性秩序。但当初其所想象的范围却是全人类的;就像欧洲人讲人类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所能指的也只是欧洲而已。关键是它们各自在历史中形成了理解世界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今天依然可以是普遍的,可以成为全球秩序的原则。

“天下”观念是中国文化最具特色、最具宏大愿景的一面。“天下”意识并不是像西方人那样要强力输出所谓“普世主义价值”;更多的是着眼于一种文化的整体性、道德性的动力,展现对人类和世界的整体性关切。当一种文化只局限于自身民族的复兴时,它的眼光也是局限的,目标是有限的,手段是排外的,动力是不足的。中华文明的复兴首先就是要还原其本来的价值目标。也就是从压缩为“民族意识”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再次释放出普世性的一面,还原其本来的“天下”意识。

“天下”概念蕴含了丰富的价值资源,“天下为公”,“四海一家”都是中国文化传统下普世关怀的价值体现。中国文化传统有关于人类的基本预设,那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海西海,天下一家”。这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对于人类的设想完全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更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于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能欣然接受。这种普世关怀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色,无论是儒墨道佛家都有“天下”的情怀,这在全球化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

在生态危机日渐严重的今日,世界上各个国家已经结成了深深的地球命运共同体。在一个这里产生二氧化碳气体,整个世界就会变暖的时代,即便单个民族国家得到“复兴”,造成的却可能是整个地球生态平衡的崩溃,那么这样的“复兴”还有什么意义呢。地球村时代,任何一个事件都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中国的复兴不以人类为关怀,就很难在这个时代展现其真正的生命力。中华文明的复兴须以这个时代人类的基本诉求为己任,须对人类的共同命运肩负起使命。一种文明只有以“天下”苍生为念,这个文明在现代世界才依然有自我超越和发展的能力。“文明中国”的复兴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得到检验。世界正在迈向一个全新的时代,以“文明国家”为基础的世界体系也必将形成一种新的“天下”秩序。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人的文明”是其他文明发展的最终归宿

□ 邱耕田

加、精神素养和道德觉悟的的提高,社会责任感的增强等等。

第二,人在总的生存和发展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状态,这主要表现为一种民生文明。所谓民生文明,是指广大民众在生存状态、发展机会、成果享有、幸福度或满意度等方面所呈现出的改善,增加、提高等的进步倾向。追求民生文明是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即要做到“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第三,人在自身生产方面所取得的开化、进步的状态即人口文明。人口方面的文明,主要反映的是人口生产对物质生产和生态生产的适应性问题,其核心是指人口生产要有一种适度合理的生长及其优良的结构关系。

第四,人的社会关系的改善,优化即人的关系文明。由于“人生就是社会的”,人在现实性上,其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的文明必然包括着人的关系的文明。人的关系的文明必然包括着人的身心关系即人的物质和精神关系的和谐、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关系的优化协调等等。当然,人的关系文明还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优化协调,但这属于生态文明的范畴。

基于现实的角度分析,人的文明已经体现于或隐含于我国所有形式的文明进步当中了——这当然需要理论工作者将这种新的文明形态提炼概括出来。从学理角度分析,提出并建设人的文明,对于促进其他形式的文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人的文明是

其他文明发展的根本目的,它对其他形式的文明建设起着“定向”的作用。就是说,整个文明实践或所有形式的文明实践最终都要落脚于“文明人”的培养和锻造上,偏离了这个根本的价值要求,文明必将不文明。换言之,文明实践或发展实践,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而这种“完全不同的人”或“新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第二,人的文明保障着、支撑着其他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如果没有人的文明,如在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道德素质等方面的增加与提高,其他的文明是不可能建设好的,人的文明和其他四种形式的文明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第三,人的文明是检验其他文明建设效果的根本标准。第四,人的文明是“纲”,它对其他四种形式的文明及其建设起着统摄作用,或者说,人的文明把其他四种文明统领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了“整体文明”的形态。因而,我们在推进我国文明建设包括人的文明建设实践中,必须坚持整体性的理念和原则。

整体文明是一种综合性或复合性的文明形态,是我们从整体性的视角对人类文明的一种把握和认识。在内容结构上,整体文明是人的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整体文明的生成是在当今人类社会整体化演进的大背景下所出现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必然趋势,它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走向和未来。

文明的发展必须具有科学性,或者说,文

明也要追求科学发展,这种科学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上述几种文明形式并不是各吹各的号,各弹各的调,自行其是,而是要协同发展,整体推进,即要走整体化发展之路。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文明?做法可能很多,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应当坚持以整体为目标的重点推进原则。社会文明的发展是整体发展,而非单一发展;是全面发展,而非片面发展。换言之,整体文明要求我们必须以整体文明观来认识并开展整体文明建设。这种整体文明观的核心,就是要坚持以整体性的思维理念来处理当今的一切文明建设或发展问题。我们对任何一种文明形式如物质文明或生态文明等的认识,都不能离开“整体文明”的视角,只有把任何一种文明形式放置到整体文明的框架内,才能获得真正准确的认识和有效的建设。例如,当前学界对生态文明的研究认识有一种不断拔高的趋向,这是一种一叶障目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形而上学化的做法。须知,如果离开了整体文明或离开了其它四种形式的文明,生态文明基本上可能不复存在。当然,整体发展并非均衡发展,不分轻重缓急西瓜芝麻一齐抓,甚而混淆主次之别,这样还是搞不好整体文明建设的。在现阶段我国整体文明建设中,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重点还是物质文明建设。当然,这个重点绝非“单一论”、“片面论”,而是“协调论”或整体论,即要围绕着物质文明的进步,积极推进其他几种文明建设包人的文明建设。

（作者系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教授）

学林漫笔



另一个最高学府

□ 王学斌

公有而公用,公开且共享,是图书馆的核心内涵。

开篇先从笔者自身亲历的一件事情讲起。就在去年,我到某著名图书馆善本库查阅古籍。刚进入书库,就碰上图书管理员阿姨迎头“盘问”:“你是教授吗?”面对这突如其来且貌似无厘头的问题,我略一迟疑,马上心想自己好歹也是有职称的高校教师,于是答道:“我是副教授”。本以为这五个字便是堂堂正正的理由,不成想阿姨下一句活将我雷倒:“我们这里规定不是正教授没资格看善本!”“这算什么理由?图书馆里的书不就是为读者看的?难道只有教授才能看懂善本?”一连串的怀疑从我的脑海中闪过。不过能看到书才是王道,我只得好好说尽,尽力卖乖,才得以“软化”管理员,终得以一窥善本真容。

查完资料归家途中,我不禁想起了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遭遇。据他在《上学记》里回忆,联大读书时,学校中“所有图书馆全部开放,学生可以自由进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整天也没人管。有的书看着名字不错就拿出来翻翻,如果觉得没意思,又给搁回去,有的非常感兴趣就借出来,如同浸泡在书的海洋里,那享受真是美极了。”然而工作后查书却总让他感觉不舒服,“我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年,做了研究员也不能进书库,要看书的话得在外边填条,然后交给图书馆管理员去拿。有一次我跟图书馆的人商量,我只查一个材料,但不知道在哪本书里,你让我进去翻一下,不必来回填条换书,太麻烦了。其实那时候我年纪挺大了,都五十多岁了,他‘恩准’我进去查书,还拿个手电筒,紧盯着我屁股后面,似乎唯恐我在里面偷书,或者搞破坏。这种监视让我觉得非常尴尬,很不舒服。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许多馆室不能入库,先在外面填条,限借三本,也许只给你找一本来,翻翻不是你还想要的,得三天半天等于瞎耽误工夫,翻了一本没用的书,时间就报废了。”

那么图书馆到底是作甚用的?众所周知,图书馆是藏书之地,但又不仅是藏书之地。毕竟古代便有许许多多著名的藏书楼。在官方,周有柱下史,汉有柱下史,唐之四部,清之四库,皆其最著者。至于私人藏书,明清时期,“绛云”、“天一”、“疏雨”、“芳椒”,殆难悉数。不过,正如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沈祖棻所言:“我国号称文化之邦,借于图书方面,历患痼疾,只知保守而不能开放,惟皇室贵族与士大夫阶级始有博览群书之机会,平民无与焉。夫图书流通之限制有如是,则教育自无从普遍,因此学术上亦少有竞争之念。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所谓能读书之人,不免养成骄奢之气习,而且所研究之学问,多属空泛,无补于实际。”一言以蔽之,重藏轻用甚至藏而不用,此乃古代藏书机构之特色。故除了极少数精英学者,大部分好学者士俱被挡在书库之外。

借镜西方而来的西方图书馆则不然。公有而公用,公开且共享,是图书馆的核心内涵,读者应“无贵贱,无老幼,无男女,无主仆之别,而皆一视同仁”。藏书亦“无古今,无中外,无派别,无主义,凡关于学术,申于讨论,关于文化者,兼收并蓄,务繁期备。使阅者咸得执其两端,以求厥中”。于是公益藏书与学术研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图书馆成为现代学术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学术研究不再高高在上,而是逐渐下移,趋于平民化、普及化。难怪号称民国图书“调查家”的许崇清说“图书馆是学问之府库,智识之源泉,大学之灵魂,学生之参考室,教员之研究室,理论之实验室,万事之问津处,实为无价之宝藏。”经此宝藏而获益之人可谓不胜枚举。鲁迅当年住在北京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全身心地投入《中国小说史略》编写工作。他室内满堆着线装书,其中一大部分是从京师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等处借来。不消说,鲁迅的这一部巨著,和他附带编就的《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等,都是利用了很多图书馆藏书资源而得。

大家都知道陈寅恪先生的名作《柳如是别传》,而此书得以写成,与图书馆亦密不可分。彼时南京合众图书馆藏有钱谦益诗文集、钱曾《牧斋诗注》等大量文献资料,为陈寅恪的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该书旁征博引各种典籍达600多种,其中单诗文集就有约240多种,这是纯靠个人藏书所无法满足的。其门生周连宽称:“我曾协助他做资料收集工作,前后达十年之久,他每天把所想的问题若干条记录下来,交给我去图书馆查找有关的资料”。可见是图书馆为这本80万言的大著提供了丰沛的资料。

当然最励志的例子还要属著名历史学家陈翰思先生。自从考入北大后,蔡几乎终日与图书馆为伴,“我名为在北大研究所研究,其实却是在北大图书馆读书。北大老师对我的益处,远远不如北大图书馆对我的益处。所以我说:北大图书馆是学生的老师,也是老师的老师。”后来赴南京工作,他更是平均每天用17个小时泡在龙蟠里国学图书馆赶馆藏的各种历史文献,总计达万卷之多。因而海量阅读对其日后成就大有裨益。他曾这样感慨道:“我生平有两个最高学府:考入北大研究所的自由研究,等于考入北大图书馆的自由研究。北大图书馆是基础,南京国学图书馆是发展。这两个大图书馆养成我在图书馆读书与搜集有关史料的良好习惯,到老也没有改变。”

文末,不妨再看一段何兆武先生对当下图书馆现状的反思之言:“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图书是国家的财富,我们要尽量地把它保护好,越翻越烂怎么办?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尽量少让人看,或者不让人看,这在无形之中,使我们国家在吸收知识方面落后了。图书馆是为传播知识设立的,着眼点不应当是建多少高楼,收藏多少图书,而应当是怎么才能让这些书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果这一点不考虑的话,图书馆变成了藏书库,唯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丧失了它最初的意义了。”切莫让广大公民生中的另一个“最高学府”大门紧闭或半开虚掩。书本就是用来供人读的嘛!

□ 责任编辑 马清伟 王敏超